



重拾中国人的色彩记忆

——品读《绝色：中国人的色彩美学》

■费明燕

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么孔子呢？都知道他开创儒学，编纂《春秋》，但是如果不由经典走近他的人生，仅凭后世将他尊为圣人，高捧到云天之上的刻板印象，远远望去，似乎总觉得缺少了一些可以被感知的温度。在好学生颜回眼里，孔子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”，是一位给他带来如沐春风之感的师长。这位师长拥有浓厚的艺术家气质，醉心诗歌，笃爱乐舞，对烹饪很讲究，也深谙色彩的妙处。林语堂透过“缁衣羔裘，素衣麕裘，黄衣狐裘”一句，感叹孔子于衣裳配色上有发明之才，他调侃道：“现代的女裁缝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孔子要用黑羔羊皮袍子配黑面子，白羊皮袍子配白面子，而狐皮则配黄面子。”这样的色彩搭配即使在今天也毫不过时。

同样是读《论语·乡党》，色彩学学者曾启雄则从“君子不以紺纁饰。红紫不以爲褻服”中发现，孔子居然对植物染色也颇有心得。表面上看，孔子是在借物比喻讲大道理，但是从不用深蓝色、黑色的面料做衣边，不拿红色、紫色的衣料当内衣穿这些细节看，孔子是熟悉染色工艺，也体恤染工艰辛的。

《绝色：中国人的色彩美学》一书是曾启雄谈色彩的著作，在《孔夫子讲真话》一篇中，他提道：“染色在早期，多半无法一次到位，染工从自然界取得染色材料后，均要通过浅染，再一次次重复叠染，才能得到深色或较鲜艳的色彩。说得

清楚一些，就是染好、晒干之后，重复这些不能间断的工序，有些甚至需要染到三十多次，才能得到预定的颜色。”所以说，拿经过漫长的时间、重复的劳动取得的成果做衣边，把染三十几遍才能得到的颜色穿在里面，真是不可助长的奢靡之风，应该被批评。

“终朝采绿，不盈一掬。”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檐。”这是经过孔子编选的《诗经·小雅》里的片断，塑造了一个满心期待丈夫归家而无心采摘的妻子形象。两千多年以前，可以采的“绿”和“蓝”是什么？在《蓝绿本一家》中，作者追溯了它们的前世今生，原来“绿”是蓼草，“蓝”是蓼蓝、菘蓝，这些低矮的草本植物采摘起来非常容易，就像采摘番薯叶那般。采了蓼草和蓼蓝后做什么用呢？当然是用来染色了。蓼草可以染黄色，蓼蓝可以染蓝色，两相叠染又形成了绿色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起的绿色就是从蓼草来的，把代表植物属性的草字头摘掉，换上了与纺织、染色寸步不离的绞丝旁。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绿字和蓝字在色彩表现上的存在感都很低，特别是蓝字，很可能是在白话文运动后才拥有了形容颜色的义项。这里不得不说古人很有意思，既能用红、丹、朱、赤、绛、彤、赭、绯、赭、赭、赭……这么多的字来对应一个红色，也能用一个青字就把绿色、蓝色甚至黑色给囊括了。

《绝色》揣着不小的野心——想要引导读者重拾中国人的色彩记忆，感悟中国



《绝色：中国人的色彩美学》
曾启雄著
译林出版社出版

人的色彩美学，恢复中国人的色彩自信。中国人有许多独特的色彩记忆，比如对于黄色的偏爱。作者通过文化比较的方式，展示了这种独特性。他说，在印度，黄色象征极乐世界；在中东地区，黄色使人联想到沙漠、干旱，象征着死亡，是忌讳的色彩；在日本，黄色容易让人联想到江户时期的金币“小判”，带有世俗、财富的味道；在欧洲社会，黄色长期以来带有背叛、胆小、低俗、颓废的意思，比如中世纪死囚的衣服是黄色的，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·芬奇在创作《最后的晚餐》时，大多也会给犹大的衣物涂上黄色。只有中国人，很早就从阴阳开始，生发出五行的概念，以五行的五个方位来对应色彩，分别是东青、西白、南朱、北玄、中黄，其中居于中央位置的正统色就是象征土地的颜色。土地

碧血凝成万古诗

——《笔墨风云·邓拓传》读后

■陈元麟

擅长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曾纪鑫，融史料的翔实、文学的灵动与理性的反思于一体，并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邓拓的生活经历、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。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文章一开始，作者就由远及近，由全面到局部，不惜笔墨，不厌其烦地为读者介绍了邓拓出生及少儿时代的生活之地——福州的地理特点、历史人文，讲述了邓拓的家庭环境及其童年生活。书香门第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，让他的心智很早就得到开启，并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童子功。

对于邓拓人生观形成的重要事件，作者不惜篇幅，诉诸浓重的笔墨。例如，1923年，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，作者详细介绍了论争的始末，并分析邓拓在这场论争中，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“唯物史观派”的观点。这是邓拓人格形成的重要基础，也恰恰是其人生悲剧的潜在因素：善于思考的个性与不容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冲突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，追求与结果的悖论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当然，他的自杀，也是一种儒家士大夫“承担责任、承受苦难”精神的表现。

在叙述邓拓人格形成的过程中，作者紧紧抓住其个性特点，将一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，给以文学性的生动描绘，从各个侧面



《笔墨风云·邓拓传》
曾纪鑫著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勾勒出传主鲜明的人物形象。

作为学者、诗人和报人，“邓拓一辈子喜欢读书，有时还将阅读视为紧张工作的一种休息与调剂”。但是，邓拓并没有躲进书斋，脱离社会实际。“他长期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，与普通百姓、群众打成一片”。

作为领导者，“他从不以官自居，跟人说话，或布置工作时，总是说请你们如何，请你们帮我如何如何”。

作者的叙事手法不拘一格，在艺术上做到张弛有度、收放自如。

在介绍邓拓作为学者和诗人的成就时，作者适当地运用评传的表现方法，对其的代表性著作，或详或略地加以分析和评议，彰显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。例如，对于邓拓撰写的被誉为“扛鼎之作”的《中国救荒史》，作者不惜篇幅予以详尽介绍，给以高度评价，并喟叹道：“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，各种灾情，从未间断。载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之中，或简略，或详细，但对灾荒的系统性研究从未有过，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。这种遗憾，却由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大学生给弥补了。”

在传记的某些片段中，作者还巧妙地将影视的叙述方式运用于环境氛围的渲染。在描绘邓拓的客厅兼会客室时，他采取长镜头的叙述方式，一一展示了陈设室内的静物，然后摇向画框，推出一个特写镜头，这是房间主人创作的一首词《青玉案》：“凄风苦雨寒天短，最难得知心伴。长夜未央相待旦；论文谈道，并肩扶案，不

识何时倦……”这种手法的巧妙运用，不仅再现了具体环境，而且衬托了主人公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的精神追求。

同样的手法，被作者运用在邓拓告别人民日报社同仁时的场景。其时，邓拓即席朗诵了一首临别赋诗：“笔走龙蛇二十年，分明非梦亦非烟。文章满纸书生累，风雨同舟战友贤。屈指当知功与过，

关心最是后争先。平生赢得豪情在，举国高潮望接天。”这回，曾纪鑫采用类似纪录片人物访谈的方式，请当年在场的时任报社文艺部负责人、著名作家袁鹰和时任报社副总编的胡绩伟现身叙说。这样的写法，现场感强，让人如临其境，历历在目。

读罢传记，百感交集。与其说作者是为传主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毋宁说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，借由一位革命的文化名人的一生，来窥视一个时代的演化过程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曾纪鑫不仅忠实记叙了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，而且作出了超越历史的反思，从而显示出其驾驭历史题材的不凡功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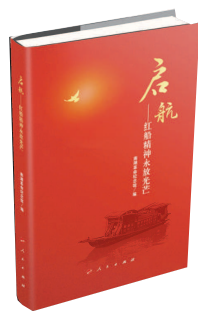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出版社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图书

《启航——红船精神永放光芒》

南湖革命纪念馆 编 定价：65.00元

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出版

“红船精神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，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，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。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南湖红船时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“红船精神”，让“红船精神”永放光芒。《启航——红船精神永放光芒》以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览解说词、馆藏实物图片及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，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全貌。



发行业务电话：010-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（100706）邮购电话：010-65250042 65289539 网址：
www.peoplepress.net